

ISSN 1605-2404

中華民國 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

3 月號
2012年3月出刊

發行所：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創刊日期：民國八十五年一月
發行人：辜濂松 總編輯：洪德生 主編：邱達生 執行編輯：黃暖婷
地址：台北市德惠街 16-8 號 7 樓 電話：(02) 2586-5000 傳真：(02) 2594-6528
PECC 網址：http://www.pecc.org CTPECC 網址：http://www.ctpecc.org.tw/



國內
郵資已付

本月
焦點

2012年太平洋經濟展望 太平洋區域貨幣政策機制經濟結構專家會議紀實

■ 王聖閔

PECC日本委員會於2012年3月17-18日，在日本大阪舉辦太平洋經濟展望(Pacific Economic Outlook, PEO)之經濟結構專家會議(STRUCTURE SPECIALISTS MEETING)，本次會議的主題為太平洋區域貨幣政策機制(Monetary Policy Regimes in the Pacific Region)，由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代表我國針對該主題發表論文，與會的經濟體包含香港、泰國、印尼、菲律賓、中國大陸、哥倫比亞、韓國及我國共8個經濟體，另外亞洲發展銀行也派員參與發表論文，日本PECC也邀請日本國內知名之經濟學家，共同對貨幣政策機制進行討論。會議摘要如下：

● 引言主題：太平洋區域貨幣政策機制

PECC日本委員會協調人Akirak Kohsaka教授

的引言首先提到上次PEO的主題-總體金融關聯與金融深化(Macrofinancial Linkages and Financial Deepening)，主要分析金融全球化之擴張



本期重要內容

- ◎ 2012年太平洋經濟展望：太平洋區域貨幣政策機制經濟結構專家會議紀實
- ◎ 2012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國際政經情勢對我國之影響研討會」紀實
- ◎ PECC農業與糧食政策論壇：「從市場波動到促進糧食安全」會議摘要
- ◎ 美、中貿易角力戰－論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產業之挑戰
- ◎ 習近平訪美之意涵

(expande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及金融深化之變化(changing financial deepening)的環境背景。金融全球化議題主要探討跨境資產及負債的增加，而金融深化議題則是主要探討金融資產的累積及分散化。

接著引入2012年的主題-貨幣政策機制及使用此機制的理由，由於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造成對現在貨幣政策架構應付全球化金融循環之有效性存有疑慮。對於已開發經濟體，規則模式之貨幣政策，也就是追求通膨目標化，但無法預防資產市場的泡沫化；對於新興及開發中經濟體，放棄緊盯美元的匯率系統，如追求通膨目標化但有較彈性的匯率及較自由的資金流動，不過仍然會面臨國際資金流動及匯率變動的風險。新興市場經濟體，如中國大陸及香港將可望放棄緊盯美元匯率政策且部份經濟體將採用通膨目標化政策。不論是那一種貨幣政策機制，新興市場在貨幣穩定性及財政餘額上的表現皆優於其他區域。

面對現今全球經濟的動盪，總體經濟政策出現三難問題(Macroeconomic Policy Trilemma)，即各經濟體利用經濟政策來達到匯率的穩定、自由資本移動及貨幣獨立性等三項政策目標，但一項政策並無法同時達到三項目標，必須犧牲一項或兩項目標來達成主要目標。近期國際貨幣組織也不得不承認資金管制及謹慎的貨幣政策在某些情況下是相當有用的。

整體而言，全球金融風暴已嚴重地影響各經濟體自身的金融系統及總體經濟發展。Akira教授表示，貨幣政策機制要如何因應金融風暴的經濟情況及如何評估貨幣政策機制的效果，有賴大家於此次會議中提出討論。

● 第一場次：東亞

亞洲發展銀行代表Peter J. Morgan首先提到他同意總體監理措施及規定是維持金融穩定的關鍵，但是總體監理政策並非所有系統性風險議題的解決方法。需要進一步討論如何建構一個合適的資本制度，可以有較低的風險並較現行資本制度可長期實行。Peter J. Morgan表視過剩政策將不會持久，如流動性過剩、資本解除管制、超額融資、承擔過剩風險等，我們必需開始考量經濟體中長期的風險及挑戰，特別是亞洲國家。

Peter J. Morgan表示，關於他的研究主要可分為三大部份：（一）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前



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代表我國於台上發表論文

後所發生的事件、（二）中長期的風期與挑戰、及（三）總體監理政策與加強政策協調之角色。中長期的風險與挑戰的部分包含：清理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財政情況的惡化、金融風暴後全球總經及財務環境、全球經濟不均衡、區域合作的重要性等。總體監理政策與加強政策協調之角色部分則是包含總體監理政策無法去除信用循環及危機發生的確定性、利用總體監理政策來防止系統性風險僅能輔助但無法替代個體監理措施、中期應更加強貨幣及財政措施。

Morgan的文章主要是透過重新檢視全球金融風暴前後的事件，進而探索亞太地區的經濟體在中長期可能會面臨的問題，及總體監理政策對於金融危機的成效。

● 第二場次：韓國與中華台北

韓國代表In Huh於報告中指出韓國的匯率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韓圓大幅貶值，且波動變大，許多公司因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及訂單的取消而受創。韓國的企劃財政部初步支持弱勢韓圓政策，但造成原物料價格高漲，因此弱勢韓圓政策受到批判。韓國企劃財政部在美國房地美(Freddie Mac)、房利美(Fannie Mae)出現流動性問題後，開始維持韓圓價值、建立大量美元賣出部位、在市場收盤對資產經理人拋售美元及直接售出美元等措施，使得外匯儲備大幅降至2,000億美元，韓國央行及美國聯準會皆擔心會發生另一次的貨幣危機，所幸外國投資持續，使得外匯市場回穩。

In Huh認為韓國已達到穩定通貨膨脹及避免貨幣危機的目標，但通貨膨脹的波動增加且外匯市場並未平穩，總體監理措施對資金流動及銀行債務的到期日延後造成影響，如何達到金融穩定成為韓國貨幣管制的另一項挑戰。

我國代表胡勝正院士首先提到由於無法遵守泰勒法則(Taylor rule)導致低利資金、房地產泡沫及



PECC日本委員會協調人Akirak Kohsaka教授

次級房貸風暴，快速的資金流造成美國房市泡沫化並擴散至其他市場導致全球金融危機。近期的歐貨危機的發生原因有三：（一）主權貨幣的損失、（二）過度使用財政政策、及（三）主權債務大幅增加。而在我國所實施的貨幣政策，從2000年就沒有管制資金的自由流動，並維持浮動的外匯兌換系統。

他提出貨幣政策的四個主要目標：（一）加強金融穩定、（二）導引穩健的銀行運作、（三）維持貨幣價值的穩定性、及（四）增進經濟發展。我國央行在每年年底會根據通貨膨脹率、GDP成長率、失業率、匯率及其他指標來訂定下一年的貨幣成長率，2011年的M2目標成長率則在2.5%~6.5%。接著胡院士提出中間量化目標，討論利用泰勒法則(Taylor Rule)及麥卡倫法則(McCallum Rule)，在因實質部門所造成的危機中，使用麥卡倫法則優於泰勒法則；在因金融部門所造成的危機中，則使用泰勒法則優於麥卡倫法則。從實務經驗發現我國所實施的貨幣政策，使用泰勒法則優於麥卡倫法則。基於物價平穩，我國央行不只注意貨幣的數量，也觀察利率的穩定，而後者的重要性是與日俱增。泰勒法則較容易了解但卻不容易執行，尤其是在有通膨缺口的時候，對央行而言，問題不只是通膨，還有對通膨的預期。

胡勝正院士最後結論，在1980年代後期因經濟發展造成超額儲蓄的累積，造成通膨的壓力，最終形成股市及房地產的泡沫化，使得資本帳必需開放。在資本帳的開放之下國際資產的變化增加成為決定M2成長率及匯率的重要因子。資金的快速流動使得央行要經常干預，因此對於M2的成長率失去控制。由於央行可用維持M2成長率來達到其目標，因此央行採用麥卡倫法則來實施貨幣政策，然而央行在減少因外來衝擊所造成的匯率波動，央行還是必需遵守利率法則。

● 第三場次：香港與泰國

香港代表Man-Keung Tang討論在具挑戰性的全球環境中，香港的經濟呈現趨緩的情況，並介紹就業率持續下滑可能是個危機，但因全球超額的流動性，使得通膨仍維持在高檔。雖然港元的升值壓力已有舒解，但港元依然處於強勢的情況，因此香港的貨幣發行局將會有進一步干預的風險存在，銀行間的拆款利率已達超低的水準，借貸成長已經趨緩，借款增加的壓力依然存在。香港的房價持續上升，造成一般民衆不易持有，因此香港金融管理局執行四項房貸的監控措施。雖然總體監控政策無法很準確地實施，但香港金融管理局認為維持緊縮的總體監控政策是適合的，但政策必需定期的檢視。由過去的經驗來看，香港的貨幣政策是有效的，因此將會持續施行。由於香港緊盯美元匯率的政策是透明、安定且可預測的，因此有強勢的外幣儲備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資產負債情況相當健全，因此市場對港幣具有信心，可以應付可能存在的金融危機。

泰國代表Chaiyasit Worawong提到泰國由緊盯美元匯率的政策轉向管理式的浮動系統及貨幣目標機制，再由貨幣目標機制轉向通膨目標機制。在全球金融危機之時，泰國採用低利率政策、貨幣市場操作及信用緊縮措施。泰國由貨幣目標機制轉向通膨目標機制之後，通膨率受到控制，但在2009年-2010年因全球金融危機加上政治因素，使得未達到通膨目標，因此泰國央行對於預期的通膨變化積極的應對，使得通膨受到控制。未來泰國央行仍將持續實行通膨目標機制，個體及整體審慎監控系統可避免金融市場所累積的金融風險。

● 第四場次：印尼與菲律賓

印尼代表Solkin M. Juhro提到全球金融危機對於印尼國內金融系統及總體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在此時期不只傳統的貨幣政策，非傳統的措施也同時實行，印尼採用寬鬆貨幣政策，將利率調整至超低水準，接著美國則使用量化寬鬆政策。在市場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全球的超額流動性造成外國資金大量流入新興市場，如印尼的低度開放經濟體，面對多項挑戰，則需同時使用多種不同的政策。目前印尼遇到三項問題：（一）嚴重的資金流入、（二）資金流動及匯率波動、（三）金融業與貨幣政策的波動。面對經濟架構的改變印尼央行對於組織性的任務將會有進一步的發展。貨幣政策要求支



各國代表於會中熱烈討論

持總體審慎監控政策，為有效執行，將會使得兩者無法分離。最終Solkin M. Juhro提出問題，區域金融合作會有什麼影響，而如何能夠加強合作？

菲律賓代表Cayetano W. Paderanga則是提到菲律賓之貨幣政策機制，在亞洲金融風暴時，菲律賓披索大幅貶值，造成國內物價上揚，但出口並未受到影響。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時，也受到不良的資產影響，因此整體金融市場呈現較保守的態度，對於貿易及出口皆有重大的影響。Paderanga分享菲律賓的經驗，採用固定匯率但犧牲經濟成長，因為政策沒有彈性，造成數次的危機，採用財政支出增加政策的比重高於貨幣政策。最後Paderanga提到菲律賓使用通膨目標政策的經驗，有不錯的成效，但造成貨幣升值。

● 第五場次：中國大陸與哥倫比亞

中國大陸代表劉東民博士提到中國大陸央行並不相信新自由理論，央行應採用容易理解且決斷的行動來調整經濟系統，並追求總體審慎規範，中國大陸央行並非一個獨立運作之部門，深受其他部門影響，如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等。中國大陸央行主要的貨幣政策包含：（一）利率的調整、（二）公開市場操作、（三）存款準備率、（四）借款限制、及（五）官方建議。中國大陸在全球金融危機時，快速的經濟回復及發展，並支援中小型私人企業，使得就業市場受到刺激。但劉博士提到中國大陸在全球金融危機後也面臨到數個問題與挑戰，如外匯的持續累積、貨幣供給過剩、及嚴格的資本管制與人民幣的國際化相抵觸。

哥倫比亞代表Jorge Hernan Toro則是提到哥倫比亞的彈性通膨目標政策，哥倫比亞採用傳統之貨幣政策，即彈性通膨目標政策，主要的目標是維持物價穩定，並使用溝通的策略，清楚的解釋政策與措施來導正通膨進入其目標。匯率的彈性可以吸收

金融危機的影響，並降低信用循環，減少過剩的外部債務。在非傳統之貨幣政策方面，過度的信用擴張及資產泡沫化都會使得通膨及出口成長受到影響，因此哥倫比亞央行加強對貨幣政策的解釋來避免金融及總體經濟的不平衡。且哥倫比亞央行也採取匯率干預，但可能會弱化通膨目標架構的可信度及與其他貨幣政策相互衝突。最後Jorge Hernan Toro提出一些經驗分享，如貨幣政策可以達到物價穩定，但無法保證總體經濟穩定；利率以外的政策也要同時使用以避免巨大的金融及總經不平衡。

● 結論

採用貨幣政策與各國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時所造成的結果息息相關，各國為了因應金融危機紛紛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值此低利時代，導致游資四竄。各國為了穩定匯率，避免游資拉抬本國幣值影響了外貿競爭力，不約而同的對熱錢進行管制。但目前景氣復甦態勢不明，各國仍然維持低利政策來增加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但是同時也造成熱錢往新興市場大量流入，國際原物料價格也持續上升，各國貨幣競貶以加強其出口的競爭優勢，最終會造成經濟不平衡出現，且新興市場因熱錢流入，造成其不動產價格大幅上升，形成資產泡沫化的隱憂。

有別於傳統上所強調的個體的審慎監理原則，此次金融危機也引起學界與金融界對總體面審慎監理（Macro prudential surveillance）的注重。不過總體面監理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監理方式，必須注重金融體系的制度面與總體經濟成長的相互關係。在採用總體面審慎監理時，無法同時兼顧匯率的穩定、自由資本移動及貨幣獨立性等三項政策目標，要如何在各項目標達成平衡點，將成為太平洋區域各國使用貨幣政策機制的最大課題。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2012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國際政經情勢對我國之影響研討會」紀實

■ 陳子穎、黃暖婷

全球化的潮流之下，國際貿易愈趨頻繁，國與國之間的經貿互賴程度也日漸升高，使得歐債危機持續延燒、中東地緣政治影響、新興市場成長動能不再，以及大國領袖接班衍生衝擊等諸多國際間不確定因素，均會透過貿易管道，甚至金融連結，對世界各國產生衝擊。

我國在地理上處於東亞地區的樞紐，又以國際貿易為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自然深受國際因素影響，但是我國能參與的國際合作機制卻相當有限，如何在既有的條件下因應變局，並且增進我國的利益，無疑是我國生存與發展最重要的課題。為此，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特別與政大公企中心合作，邀請產、官、學界久負盛名的專家與談，並請CTPECC洪德生副董事長、台灣經濟研究院龔明鑫副院長主持，共同探討國際政治、經濟、金融的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進一步整合各界意見，針對我國未來的生存與發展之道提出對策。

● 第一場次：國際政經現勢與我國之因應

● 凱基證券魏寶生董事長：全球經濟緩成長趨勢確立，開放的兩岸政策決定台灣榮枯

歐洲央行大舉注入流動性成功為歐債問題買到時間，短期系統性風險降低，導致市場資金在低利率及通膨預期拉高的環境下，再度擁抱風險性資產，並回流新興市場，引領去年第四季遭受過度修正的股市展開強勁反彈行情。在資金行情重新啟動下，籌碼面優勢使得短線趨勢得以延續，股市評價正逐漸修復至正常水平；然而在美國及歐元區分別對家庭債務及國債進行去槓桿化的過程下，全球經濟成長力道逐漸趨緩，IMF也再次下調全球經濟成長預期，仍為長線隱憂。

相對於歐美，中國大陸經濟今年將呈現「前低後高」的走勢，經濟可望維持軟著陸，在政權轉移的敏感時刻，目前中國大陸中央對經濟政策目標仍以「維穩」為主；2012年上半年雖有調降存準金與養老金救市傳聞所形成的政策底，但歐債問題、經濟下滑、國際板推出傳聞，以及中國支柱行業一房地產政策未明顯放鬆等利空，仍將反覆測試指數底部；下半年隨著政權交接班逐漸落實、通膨壓力下降經濟回穩、指數進入低基期、資金流動性可望

放寬下，指數空間可望上移。

「十二五」無疑是中國大陸新一輪經濟發展的指導原則，分為經濟成長、科技教育、資源環境與人民生活等四方面，又以「節能」和「經濟轉型」為核心目標，進行結構調整；未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增速料將更為溫和、穩定，出口對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貢獻將放緩，而貨幣供給回升，將是判斷經濟是否見底的關鍵。此外，中國大陸政府的財政補助將擴大，貨幣政策與流動性也將轉趨寬鬆以避免經濟下行風險，但社會融資成本並不會很快下降。在私部門方面，受到外需下滑、地產投資受限、資金成本升高的影響，未來中國大陸的企業盈餘恐將繼續下滑。

魏董事長認為：開放的兩岸政策將決定台灣榮枯；在ECFA之下，石化、紡織、機械及運輸工具等產業將是主要受害者，而上述產業與電子、金融業也是下階段ECFA降稅談判的標的，值得關注。展望未來台股，總合產品設計銷售(Collaborativ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CDM)的毛利將改善，盈餘也將成長；半導體、低價電子風潮（如LED TV、智慧型手機的降價）與觸控面板相關產業也將有成長，而水泥、航空、合成橡膠與布局完整的租賃業，也將因中國內需市場而受惠。

● 政大國發所童振源特聘教授：歐債、FTA、中國大陸使台灣面對機會與挑戰，國內應儘快凝聚共識，處理兩岸、區域與國際經貿問題

童教授首先分析我國所面對的國際政經情勢，認為歐債問題使得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如果歐債問題進一步惡化到IMF評估的最壞狀況，那麼對於三分之二經濟成長貢獻來自國外淨需求的台灣來說，今明兩年的經濟成長率可能不到2%。其次，區域經濟整合加速之下，我國最大的競爭對手—南韓已經完成包括與東協、印度、歐盟、美國在內的9個FTA，並正在與七個經濟體洽談FTA，南韓與中國、日本的自由貿易區談判也可能於今年正式啟動。相對於南韓正迅速邁向東亞自由貿易中心、東亞經濟平台的國家目標，我國除了FTA洽簽進度遠遠落後之外，至今也沒有向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既有會員國正式表明願意參與協商，提出完整的規劃；同時我國的國家競爭力持續低迷，外商對台灣投資金額、國際資金流動與台灣的國內投資率都在持續下降中。然而，中國大陸的



第一場次「國際政經現勢與我國之因應」演講人與主持人合照：（由左至右）凱基證券魏寶生董事長、政大國發所童振源教授、CTPECC洪德生副董事長、全國工業總會蔡宏明副秘書長

國際實力卻正持續擴散，能夠運用的資源迅速擴張，兩岸經濟實力的差距在短期內仍會持續擴大不說，中國大陸也仍持續強化對台灣的軍事威脅。

在如此嚴峻的情勢之下，童教授進一步點出我國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機會方面，未來民進黨對於ECFA後續四項議題談判的反對會比較從利益與所得分配的角度著眼，而不是從政治或主權的角度強烈反對。也就是說，朝野政黨能比較務實討論兩岸經濟整合與合作議題。此外，選舉期間與選後，美國對於「零八共識」的表態支持，認為馬總統的政策有助於穩定兩岸關係。在美國的支持下，兩岸可以在此基礎上繼續協商新的功能性議題與互動機制，並且抗拒政治談判壓力。第三，從現在到2014年底，台灣沒有重大選舉，提供朝野凝聚國內共識的適當時機。同時，習近平在今年秋天接班後，大概有二年的調適期。因此，從現在到2014年底，台灣朝野應該凝聚共識、建構朝野互動平台，才能突破台灣的國際困境。挑戰方面，首先中國大陸過去四年對台灣進行經濟讓利，在馬總統第二任內，中國大陸勢必希望能從台灣得到政治回報，即使無法達成兩岸政治協議，也希望展開政治對話，更明確化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治定位，或至少簽署兩岸社會與文化交流協議。其次，面對東亞經濟整合體制的快速發展及南韓的強勢競爭壓力，台灣如何順利推展兩岸與區域經濟整合協議，將是馬政府很大的挑戰。第三，台灣的國際空間突破壓力。如果未來四年仍沒有突破，民衆將質疑兩岸外交休兵政策的成效。

因此，針對我國該如何因應，童教授建議面對台灣的國際困境與中國大陸的國際實力持續擴散，馬總統應該將國內共識的凝聚作為施政第一要務，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和發會），建構朝野互動與互信的平台；未來四年的兩岸談判則應該集中在經濟議題及兩岸合作的功能性議題談判。經濟議題除了ECFA的後續四項議題之外，兩岸政府可以優先針對貨幣清算機制、媒體與網路、電子商務與文創產業等議題進行談判。在區域與國際經濟方面，面對國際經濟的激烈競爭與區域經濟整合體制的快速發展，童教授建議我國不僅應該推動兩岸經濟整合，同時也應該全力推動台灣與美國、日本、歐盟及東南亞等主要貿易夥伴的經濟整合協議，採取平衡與多軌並進的方式，突破參與東亞經濟整合體制的困境。

- **全國工業總會蔡宏明副秘書長：後ECFA時代，台灣應轉型為跨國企業區域性營運總部，並準備開放市場與全面自由化**

展望2012年經濟情勢，蔡副秘書長認為應注意歐債問題延續、美國復甦力道、產油國政治不穩定使得高油價影響全球經濟復甦，以及大陸經濟成長

減緩的因素的影響。面對上述情勢與美韓FTA、東協加一對我國的影響，我國產業附加價值率偏低，無疑是最大的癥結與挑戰。

因此，在後ECFA時代的企業經營策略上，蔡副秘書長認為ECFA簽署後，台灣成為跨國企業區域性營運總部的可能性提高，企業應思考新投資機會與營運，如：增加中間產品或零組件運回台灣加工後外銷，改變過去以大陸為組裝基地的營運模式改為在台灣從事附加價值製造，所以企業也應調整臺灣之角色定位，如設立研發中心，品牌、研發、整合製造資源，都是可行之道。

在面對區域經貿自由化方面，雖則馬總統將TPP立為十年內要加入的自由貿易協定，但由於要參與TPP須經過TPP會員共識決同意後始得加入，為爭取加入TPP，台灣必須達到TPP的高標準，特別是因為TPP協議涵蓋範圍廣、開放程度大，關稅減讓不是唯一的主題，法規接軌、市場競爭規則、政府採購、競爭政策與智財權保護等議題，都將是被要求承諾開放的談判重點。因此，台灣在推動加入TPP時，必須要有開放市場與全面自由化之準備。

最後，在各產業未來五至十年產業發展布局與國際合作策略方面，蔡副秘書長做出以下三點建議：一、找出各產業中長期的發展方向，以及應提前投入的關鍵技術項目，儘早為未來競爭力作準備；二、擴大「跨領域整合」、「結合美學」、「設計、人文與科技應用」、「服務業」等領域，促進企業朝創新高值之路邁進；三、針對新興產業發展需求，分別找出有助於科技創新與計數突破所需要之國際合作方案，並尋求將該等方案納入全球策略聯盟的策略。

- **第二場次：國際金融情勢與金融連結對我國之影響**

-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林蒼祥教授：歐債危機對台灣影響不大，中美經濟、國內系統性危機與台幣大升值值得關注**



第二場次「國際金融情勢與金融連結對我國之影響」演講人與主持人合照：(由左至右)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章遠智組長、台灣經濟研究院龔明鑫副院長、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林蒼祥教授、東亞證券(台灣)王伯鑫董事長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林蒼祥教授認為歐債危機對台灣金融影響不大，除了金融、壽險業持有的歐債少之外，台灣金融機構評等也相當穩定，迥異於EU銀行信評及EU各國主權評級大幅下調。金融海嘯後歐美去槓桿化及消費動能減緩，也皆未弱化台灣企業財務體質，政府財務體質大幅優於歐美，主權債基本面穩健，持續吸引國際資金投入台灣；歐債對台灣真正的影響，應是全球需求減少，導致台灣出口、經濟增長受創。

林教授再以學理與歷史案例印證，表示貿易依存度越高，該國貨幣升值對經濟衝擊力越大：1971年尼克遜時代財長J. Connally曾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其最明顯之見證，即為1985廣場協議後，日圓劇升，從250日圓兌一美元，達到1995年4月79.75日圓兌一美元的高點，使得日本經濟大泡沫破後，「失落20年」。回到國內，經濟部2008年研究台幣升值所增出口成本可轉嫁的百分比：對中國大陸70%，對日60%，對歐盟20%，對美0%，因此歐元貶值，將不利我國「毛(利)3到4」的電子業。

林教授最後並重申：台灣總經基礎好、財政穩健、外匯儲備充足，除非EU主權債務危機演變成負債國家無序違約，否則台灣所受影響有限。台灣應該關注的外在問題，是中國大陸與美國的經濟，以及台灣本身的系統性危機及台幣大升值。儘管根據2011年4月的資料，歐盟是中國大陸最大出口市場，占19.8%，使得歐債危機具有「歐盟經濟成長降1%，中國出口成長就減6%」，對台灣不利的影響力，但是隨著美國消費者信心止穩，中國大陸物價漲勢趨緩，政策轉至穩定經濟，歐債危機對台灣的影响也隨之降低。

● 東亞證券(台灣)王伯鑫董事長：歐債危機已轉危為安，節能減碳是台灣經濟長治久安必要手段

東亞證券王伯鑫董事長則認為自從歐洲央行於2011年12月21日第一次進行36個月無上限融資標售(LTRO)，一共對523家銀行合計借款4890億歐

元，並在2012年2月29日對800家銀行合計放款5295億歐元，成為歐洲銀行業的靠山之後，歐洲原本緊張的金融情勢就改觀了。而Euribor與OIS之差明顯回落，顯示歐洲銀行之間的拆借意願開始上升，銀行之間的套利交易(借低利率投資高息債)也救了西班牙與義大利。儘管歐債危機並非雨過天晴，歐洲央行的舉措已經有效地推升全球風險性資產，也促成多數貨幣兌美元走升；不過各國央行在一輪積極寬鬆政策後將會暫停下來，觀察景氣是否回到復甦的軌道，提防通膨惡獸的重現。

王董事長提醒大家：油價上漲對台灣的影響超過多數亞洲國家，油價每上漲10美元，台灣的貿易收支餘額會減少0.9%；如果油價上漲至每桶130美元，台灣CPI增幅可能增加0.2%，而油價每上漲10美元將使台灣企業獲利減少2.3%，運輸與石化將首當其衝受害。台灣的能源使用效率能源的使用效率雖在亞洲居前，但仍輸給許多國家；未來節能減碳不僅是環保口號，也是台灣經濟長治久安的必要手段。

● 經濟部投審會章遠智組長：金融危機對我有限係因兩岸開放，但未來我國金融業的國際化仍須注意客戶、人才、市場據點

章組長首先舉出日本央行針對亞洲金融市場彼此關聯性，以及其與歐洲、美國及日本等已開發國家市場的連結程度所做之實證研究，發現不論地區或發展程度，股票市場走勢幾乎均完全相同，尤其美國市場變動產生的外溢效果(spillover)十分明顯，幾乎已成為各國股票市場主要波動來源，但股市高度的外溢效果對實質經濟的影響卻十分有限。在實質經濟的外溢效果方面，中國大陸經濟對區域內各國的經濟有顯著的影響，成為影響區域內各國經濟波動的主要來源之一。

受惠於兩岸政策的開放，近兩年國內經濟迅速由谷底回升，使得銀行業在國內的獲利大幅提升，加上兩岸金融業務往來快速成長，已成銀行未來獲利的主要來源之一，使得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業之影響有限，但是我國金融業若要往大陸市場拓展，台灣的金融機構能否提供大陸消費者創新、具差異性(differentiated)的服務，以及台灣金融業是否準備好與外資銀行一較高下，設法留住人才，尤其高階管理人員，已成為必須面對的挑戰。

展望未來台灣金融業的國際化，章組長指出：東南亞(特別是越南)及美國，已成為我國銀行在海外設立據點之主要地區；未來我國金融業應該思考「下一個據點」、「客戶、人才在哪裡」等問題，以建構國際金融連結，提高海外營收比例，為我國的金融業真正找到源頭活水。

(本文作者均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PECC農業與糧食政策論壇

「從市場波動到促進糧食安全」會議摘要

■ CTPECC秘書處

2011年12月1-2日，PECC太平洋糧食展望（Pacific Food Outlook, PFO）論壇在台北歐華飯店舉行，主題為：「從市場波動到促進糧食安全」。與會國際學者分別來自亞洲開發銀行（ADB）、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以及菲律賓、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印尼等國家的知名智庫與大學的相關領域。PFO主席Walter Armbruster、我國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張靜貞，以及CTPECC共同策劃、辦理此一重要之國際會議。

● 聯合國糧農組織曼谷辦公室David Dawe博士：2006～2006年糧價波動的影響

David Dawe博士聚焦兩個問題：第一，世界糧價如何與為何轉嫁到國內糧價上，因為農人與消費者均無法直接與世界市場互動；第二，檢視不同國家中，糧價如何影響貧窮問題。

有關世界糧價與國內糧價的連動關係，從總體趨勢看起來，大多數國家境內的主要糧食價格都有緩步上升的趨勢，而Dawe博士也特別選擇2007~2010年間的國內主要最低等糧食（包括稻米、小麥、玉米）平均價格而非消費者物價指數觀察，並以本國貨幣計價，避免匯率升降造成的失真，以求更精準了解窮人消費模式。

經研究之後，發現2008年7月的糧價即便經過平減，仍然比2007年一月高出很多，而若比較2008年與2007年的全年糧價，也顯示全球糧食危機期間，世界糧價推漲國內糧價的程度，也高於一般時期。Dawe博士進一步指出：對於如孟加拉、馬拉威、越南者等國，窮人可能花35%以上所得購買糧食，卻在這一年間實質收入可能減少9%；即便之後2008年第二季，國際糧價崩跌帶動大多數國家國內糧價向下調整，但是2010年第二季回復2007

年一月水準的國際糧價，卻未引領國內糧價同步下跌，價格仍舊維持比2007年一月高出20%左右。

影響國際糧價與國內糧價之間連動關係的因素包括：交通成本、該國本身的糧食自給率、匯率與國內動盪。但是在這些因素之中，貿易政策或許是影響國際糧價與國內糧價連動關係最基本的因素。在2006至2008年全球糧食危機期間，貿易政策干預在發展中國家相對常見，而政府干預糧食進出口貿易的程度，也影響了國際糧價轉嫁國內糧價程度的多寡。糧食貿易政策的另一項政策工具是進出口關稅，但是除非進出口關稅隨著世界糧價而轉變，否則大多數狀況下，進出口關稅並無法阻擋國內糧價與國際糧價的連動，但調高進口關稅仍能減緩國際與國內糧價間的遞移。

綜合觀察起來，平抑糧價不需要在中程減少農業生產，而且如果農民面對的風險能夠因此而減少，反而會促進農民生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糧價的高漲，會使勞力密集產業也會因為薪水不得不上漲，而減低競爭力；勞力密集產業的工資上漲也會使得農業就業人口減少，總歸而言，糧價高漲會帶來貧窮人口的增加。

● 南京農業大學鐘甬寧教授：存糧與價格控制是否能穩定糧食市場？—近來世界糧食危機的啟示

鐘教授首先檢視2007-2008年糧食危機期間，價格行為與存糧和政府干預行為之間的運作，發現2007至2008年年中主要穀物價格暴漲了3倍，但是2008年年中之後，價格卻更快暴落。在這樣的暴起暴落下，用存糧來平抑糧價似乎是個可行的方式，但2000至2005年間的國際糧食供需真的如價格所顯示的一樣平衡嗎？如果不是，那麼存糧是否真能平抑糧價，推遲市場訊號？

追蹤世界存糧的變化之後，鐘教授發現世界

米、麥、粗糧和玉米的存量，自1999/2000年起就開始穩定下滑，且持續10年之久；當2005/2006年間存糧已經減少1/3~1/2時，糧價即開始上升，而糧價何以會在供應開始下滑之後，隔了五、六年才開始上漲，則是存糧釋出的價格平抑作用所致。有趣的是，在糧價受到平抑之下，生產成長的幅度似乎也降低了。因此鐘教授初步歸結了糧食生產、糧價與存糧之間的關係：(1) 糧食的產量與成長，似乎與當下和推遲後的糧價有關；(2) 既然糧食消費相當固定（或固定成長），糧價的改變可能會反應糧食生產與存糧的改變；(3) 存糧的改變很可能是市場作用力與政策干預聯合造成的結果；(4) 存糧的量可能對於往後數年的市場價格與糧食生產，有重大的影響。就此，鐘教授推論：如果目的相同，那麼控制糧價與控制存糧數量，應該會有一樣的效果。

經以中國大陸1978至2004年的相關資料進行實證研究之後，鐘教授認為搞清楚「長期穩定的糧食供應和可接受的糧價改變」，以及「短期的糧價震盪與對窮人的福祉效果」這兩項政策目的非常重要，而在塑造糧食安全政策上，糧食的供應量或許比糧價更值得看重；窮人的福祉效果則可透過收入或其他手段來解決，不需要執著在價格工具上。

● 澳洲 Adelaide 大學 Kym Anderson 與 Signe Nelgen 教授：全球金融危機下的糧食貿易扭曲

農產品貿易限制在糧價上漲期間改變的方式與程度如何，而糧價大幅上漲又如何因此而生？Anderson 與 Nelgen 教授以 Freund 與 Özden 於 2008 年提出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輔以 2004~2010 間的資料，進行經驗研究，解釋各國的糧食市場干預行為，得出的結論是：回應國際糧價竄升的貿易限制，目的是在於達成各國政府各項隱藏或明顯呈現的目標，其中最經常提到的，就是確保國內家計單位有足夠的平價糧食供應，其他還包括在糧價上漲的狀況下，平抑通貨膨脹或平衡收支壓力。然而，大多數的政府都可以改用國內貨幣或財政手段，達到貿易條件限制能達成的效果。

傳統針對糧價上漲的貿易政策反應並不可取，原因乃在於其對於穩定國內糧價並沒有太大的效

果，而且會因為國際貿易的功能在政府政策下被削弱，反而會使得國際糧價更加脆弱；尤其在糧食需求加入了氣候變遷、生質能源等需求之後，狀況尤甚。Anderson 與 Nelgen 教授認為，愈多國家的政府干預其國內糧食市場，就會引起更多國家跟著做，並將對國際糧價產生更大的影響。此外，干預政策也會影響糧食順差國與逆差國的福祉，甚至會加深貧窮。

因此，Anderson 與 Nelgen 教授建議各國政府應採取多邊合作手段，去除農業貿易的障礙，而 WTO 即為一相當適合的平台。在目前 WTO 杜哈回合中，目前雖有摒除農業出口補貼與進口農產品關稅的提案，但是發展中國家提出的特殊安全機制（Special Safeguards Mechanism, SSM）仍然准許發展中國家提高農業進口障礙，以應國際糧價的突然變動。最後，兩位教授以計量經濟學進行至 2030 年為止的預測，認為即便只有發展中國家採行農業貿易限制，仍然會對世界經濟產生相當的負面影響，所以兩位教授最終再次疾呼所有國家應跟隨已開發國家農業政策的潮流，降低農業貿易障礙。

● 台大農經系張靜貞教授：氣候變遷風險與資訊科技發展對農糧體系的影響

張教授首先指出，自 1970 年代開始，有回報的全球天災急速增加，其中洪水、乾旱與暴雨是影響人類自然災害的前三名，而這三項災害自 1980 年代起也急遽增加。若就地區而言，亞洲的 APEC 會員體（尤其是東亞與東南亞地區）又比其他地方受到更多的天災影響；其中洪水本身造成的人員與財產損失、基礎建設損壞，以及隨之衍生的流行病傳播與土石流所造成的土地與農業損失，還會為以農維生的鄉村居民，帶來週期性的貧窮問題。

接著張教授舉出 2011 年泰國水災、聖嬰 (El Niño) 現象、氣候暖化與海平面上升等天災現象，輔以實證研究，證明糧食儲備與農產品貿易機制可以有有效的降低天災對各國糧食供應的影響。最後，張教授認為包括基因工程、地理空間資訊、早期警報系統等科技，都可以在對抗天災帶來的農糧災損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組織改革與政策創新卻是使這些新科技發揮作用的要素：目前各國回應



與會學者大合照

(第一排, 由左至右) 印尼Padjadjaran大學農業政策與商務中心Ronnie S. Natawidjaja教授、哥倫比亞EAFIT大學亞太研究中心Adriana Roldán Perez教授、PECC糧食安全前瞻計畫主持人Walter J. Armbruster、台大農經系張靜貞教授、澳洲Adelaide大學Signe Nelgen教授、紐西蘭Auckland大學APEC研究中心Robert Scollay教授

(第二排, 由左至右) 澳洲農業與資源經濟科技局Terry Sheales、菲律賓大學Los Banos分校Salvador P. Catelo教授、國際糧農組織曼谷辦公室David Dawe博士、PECC糧食安全前瞻計畫資深協調人William T. Coyle、加拿大British Columbia大學Rick Barichello教授、澳洲昆士蘭大學Malcolm Wegener教授

天災的方式多半限於短期措施，但是面對許多亞洲國家糧食消費日漸升高的現況，結合社會、經濟、生物物理學、地球化學與氣候體系等層面，進行廣泛的跨國公私部門農糧政策對話與合作，才是共同回應亞太地區農糧安全議題的根本之道。

● PECC糧食安全前瞻計畫主持人 Walter J. Armbruster：亞太農業競爭力的研究與發展

Armbruster首先指出：二次大戰以後，由於科技的進步，糧食的價格因產量成長而下滑，但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口成長、能源需求與所得增加，卻也持續推升糧食需求；2006至2008年與2011年的糧價高漲，更是凸顯了這一點。此外，糧食需求的增加，也使得土地、水等自然資源持續在未來數十年中，面臨更大的壓力。因此，追求永續農業發展，在增加農產供給的同時，減少生物多樣性損失、水污染、土地侵蝕、水源短缺、溫室氣體排放等問題，便成為未來農業唯一的指導原則，而要達成農業永續發展，則需要綜合資源、生產要素與價格機制，進行更有效的安排，「總合因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評估也因此愈來愈廣為研究者所用。

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五項評估農業綜合因素生產力的指標：土地、勞工、家禽家畜頭數、農業機械與化學肥料的使用量；以此為基礎的相關研究，發現雖然全球農業投入日漸減少，但是TFP的增加，使得全球農業產出除了在1990年因蘇聯瓦解所帶來的肥料短缺，使得農業產出受到影響之外，每年仍可維持接近2%的成長，而在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各會員體中，又以中國大陸、智利、馬來西亞與越南等國，在1970-2007年間，有超過2%的年均農業產出成長，最令人矚目。相對於全球生產率成長的放緩，TFP的增加，確實對全球農業產出的增加有所貢獻，也紓解了農業生產資源受限的壓力，所以如果未來農業供給要跟上全球需求的增長，TFP的持續增加，將會是關鍵因素。

Armbruster也探討了全球農業研究的狀況，發現公部門與私部門的農業研究常有相輔相成的效果，而發展中或低度發展國家，也常依賴已開發國家的農業研究結果。就此，Armbruster提出了下列政策建議：一、公部門補助增進農業生產力相關研究，不僅必要，而且需要增加；二、公私部門需要攜手合作，以各自的長處，共同面對農產需求增加的問題；三、為了因應未來的農產需求，科技(包括生物科技在內)是必要的；四、為使農產大規模增加，必須支持公私部門基礎建設投資；五：移除全球與區域貿易障礙，將會促進農業生產，並且為農產進出口國創造經濟機會。

● 哥倫比亞EAFIT大學亞太研究中心Adriana Roldán Perez教授：拉丁美洲糧食貿易在亞太地區的潛在角色

Roldán教授首先指出：近年來拉丁美洲經濟急速成長，確實有助於貧窮問題的些許改善，然而2006至2008年與2011年的糧價高漲，以及全球金融海嘯確實對拉美的勞工市場帶來負面的影響，也加劇了拉丁美洲本就嚴重的貧窮問題。雖則如此，拉丁美洲在農業生產上的相對優勢，仍然使其在全球農業生產上，具有關鍵性的供給地位。

都市化、人口與收入成長，使得大多數亞洲國家無法靠自己供應國內糧食需求，而成為糧食淨進口國；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資料分析，2005-

2009年間，亞洲國家有30億美金的糧食貿易赤字，而且自2007年起即呈現大幅上升的趨勢。從亞洲國家糧食進口的趨勢觀察，2001至2009年間，亞洲境內的糧食進口貿易從50%下跌至45%，美加地區的進口仍維持29%，但拉丁美洲從原本的9%進步到15%，顯示拉美國家對亞洲國家糧食出口的地位日趨重要。

若以國家來觀察，亞洲國家進口拉美農產的前三名分別是中國大陸(43%)、日本(21%)、南韓(7%)，而拉丁美洲國家出口農產至亞洲的前三名則分別是巴西(48%)、阿根廷(24%)、智利(12%)。此外Roldán教授也以HS Code 4碼為基礎，分析十項拉美與亞洲國家間主要農產貿易項目的市場趨勢，最後並建議：一、拉美與亞太地區間的農產貿易應該有更細項的分析，以了解貿易趨勢；二、應仔細研究非關稅貿易障礙，以了解拉美與亞太區域間農產貿易的潛力，以及制度架構如何構成貿易障礙，以及現下制度性與非制度性的亞太與拉美區域經濟整合架構，該如何克服兩大洲之間的農產貿易問題。

● 澳洲農業與資源經濟科技局Terry Sheales：鳥瞰亞太穀物市場

Sheales在本篇開宗明義即指出：亞太地區在穀物進出口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區域內主要的穀物出口國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泰國、越南；日本與中國大陸則主導穀物進口，但南韓、印尼與菲律賓也具有影響穀物進口的地位。所以本文將從供給、需求、貿易與價格四方面觀察亞太穀物市場，並點明影響市場長期發展的重要因素。

接著Sheales考察了米、麥、雜糧與油籽的生產、消費、出口、存量與價格，發現亞太地區的稻米貿易近年來強勁成長；長期越南將超越泰國，成為亞洲地區的第一大稻米出口國，美國的稻米出口也有增加的趨勢，而就淨稻米進口國來說，墨西哥的地位將最為重要。小麥方面，美國、澳洲與加拿大都將持續增加小麥出口，而印尼、日本與南韓也仍將維持亞太地區主要小麥進口國的地位。在雜糧進出口上，美國、加拿大與澳洲將會穩定成長，而日本、墨西哥、南韓與中國大陸的雜糧進口也將穩定成長。此外，美國仍將是亞太地區最主要的油籽出口國，而中國大陸也會是主要的油籽進口國，其

進口量將與畜牧業的持續成長連動；日本與墨西哥也仍將維持主要的油籽進口國地位。

在影響穀物需求與供給上，Sheales舉出了下列具有影響力的因素：生產力增長、穀物部門的投資、氣候變遷政策、人口、所得與消費者偏好趨勢，以及生質能源對穀物的利用。在生產力問題上，雖然已開發糧食供應國的生產力成長率逐漸緩慢，但是整體穀物生產預計仍將增加，而且將會更有效利用資源；有關穀物部門的投資方面，糧價抬高與匯率升值都將是鼓勵穀物部門投資增加的正面因素，土地與水資源的使用限制也或將在糧食消費增加的趨勢下，推動糧食進口增長。此外，與穀物運輸與儲存相關的基礎設施，仍需持續投資與建設。在氣候變遷政策上，溫室氣體減排與基因工程都將影響未來的穀物供給；人口與所得增長，以及生質能源對穀物的利用，則都必將增加亞太地區對穀物的需求，並可能使得亞太地區糧價變動更加劇烈。

● PECC糧食安全前瞻計畫資深協調人William T. Coyle：全球生質燃料生產與糧食安全：亞太地區的啟示

Coyle認為：雖然2005年至2010年間，全球生質燃料的生產大幅擴張，但仍僅佔全球交通運輸燃料不到3%的份額，所以生質能源對全球農業的影響，或有被誇大之嫌。未來生質燃料是否會擴大運用，有賴於未來的油價、生質原料供應是否足夠、其他非化石燃料的替代品，以及各國政府是否持續支持生質能源政策等因素的影響。在油價高漲之下，農產品的製造、運輸與行銷成本都將受到影響，而農業將不只成為能源的消費者，也將成為能源的供應者。

目前生質能源的應用主要集中在美國、巴西與歐洲，而且與政府的政策支持相關；未來生質能源是否能擴大運用，主要受以下因素所限：一、生質能源獲利低且持續下降；二、環境與糧價對生質能源應用的負面影響，以及未來政府可能因預算短缺，而降低對生質能源的支持；三、混合生質燃料與化石燃料的科技限制；四、使生質能源成本得以降低的科技，進步相當緩慢。

(本文由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黃暖婷摘要整理)

美、中貿易角力戰一 論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產業之挑戰

■ 花佳正

● 美中貿易衝突與貿易赤字

近十年來，美中兩國間的貿易摩擦時有所聞（表一），然而過去在全球景氣熱絡之際，美國對於美中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議題尚能容忍，但自2008年發生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後，美國國內的保護主義猶然而生，對處理美中貿易逆差、人民幣升值等議題的態度日益強烈。而且自從美國總統歐巴馬在新經濟刺激計劃中提出了「買美國貨」(Buy America)的主張，這一條款更暗示著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重新抬頭，作為美國重要貿易夥伴的中國大陸，對此提出了反對的聲音，並提出相關的抵制措施，導致美中貿易關係的進一步惡化。

在金融海嘯發生後，美國製造業希望美國政府採取強硬措施，以削減美中貿易逆差，制止兩國間的貿易不平衡。由表2可知，除了在2001年網路泡沫化造成的經濟衰退，使得美中的貿易赤字成長率為負外，截至2007年為止，平均每年美中貿易逆差皆以將近20%以上的速度在成長，直到2008年的金融海嘯和貿易保護主義興起，才讓美中貿易赤字成長率降到3%左右，甚至到了2009年金融海嘯衝擊最嚴峻之時，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成長率高過由中國大陸進口的成長率，美中貿易赤字甚至出現14.83%的負成長，主要是由於美國對中國大陸

的貿易團體希望美國政府能採取措施，削減美中的貿易逆差，以制止兩國的貿易不平衡，而在2011年第三季全球景氣復甦開始趨緩之際，美中貿易赤字的成長亦明顯開始降低。

● 「人民幣升值」議題仍是美中貿易關鍵

要處理美中貿易摩擦與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的關鍵，還是對於「人民幣升值」議題上，美中雙方仍未達成共識，代表美國商業和製造商利益的美國工商理事會(US Business & Industry Council)曾多次抨擊歐巴馬政府的貿易政策，形容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是「擁抱熊貓」(Panda Hugging)政策。該理事會研究員托納爾森(Allen Tonhelson)就明確指出，美中貿易問題不少，最嚴重的就是人民幣幣值受到操控，歐巴馬政府應對中國大陸施加壓力，並讓國會通過法案，以打擊貨幣操縱。

然而日前景氣復甦尚未趨緩之際，美國商務部與中國大陸舉行美中商貿聯委會時，美國財政部表示，人民幣匯率缺乏靈活性，以及中國大陸囤積大量外匯儲備，有可能使兩國在減少貿易失衡方面取得的進展功敗垂成，但中美雙方均認為，同意繼續鞏固和加強在聯委會下，設立十二個行業合作工作

表1 近十年美中貿易摩擦事件概要

時間	美中貿易摩擦重要事件
2002年3月	美國啟動對鋼坯、鋼材等實施配額限制或加徵關稅的「201」條款。中方宣佈對美部分產品中止減讓關稅。
2002年4月	美國對中國出口的汽車擋風玻璃加徵3%到124%的關稅。
2003年11月	美方宣佈對中國三類紡織品重新設定配額，對中國產可鍛鑄鐵管件徵收反傾銷稅。中方宣佈對原產於日本、韓國、美國的進口甲苯二異氰酸酯(TDI)徵收反傾銷稅。
2004年5月	美方裁定中國彩電在美傾銷成立，決定徵收反傾銷關稅。
2005年4月	美國舒默提案要求人民幣升值，否則將對中國商品徵收27.5%的懲罰性關稅。次年九月，美國參議員舒默和格雷厄姆放棄對中國進口商品實施懲罰性關稅議案。
2005年5月	美方對中國七類紡織品設限，11月中美達成紡織品協議。
2007年3月	美方查出中國寵物食品原料含有三聚氰胺，四月美國南部4州停售所有中國水產品，五月美國停用所有中國產牙膏。
2008年12月	美方對產自中國的環狀焊接鋼管徵收最多40.05%的反補貼稅。
2009年8月	世界貿易組織(WTO)裁定，中國對美國書刊、電影和音樂實行的銷售限制，違反了全球商業規則。
2009年9月	美方對中國產輪胎徵收關稅，中方宣布對美部分汽車和肉雞產品啟動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調查。
2009年11月	美方於11月5日再度表示，將對中國生產的輸油鋼管徵收36.52%至99.14%的初步反傾銷關稅。
2010年3月	WTO上訴機構認定美方對中國產標準鋼管、矩形鋼管、非公路用輪胎和複合編織袋採取的反傾銷、反補貼措施，以及「雙重救濟」做法，與WTO規則不符。
2011年1月	美國參議院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立項預案，全案將送交眾議院進行表決。

資料來源：亞洲週刊23卷38期、本文補充整理

表2 美國對中國大陸進出口與貿易赤字概況

時間	由中國大陸進口金額(百萬美元)	出口至中國大陸金額(百萬美元)	貿易赤字(百萬美元)	由中國大陸進口成長率(%)	出口至中國大陸成長率(%)	貿易赤字成長率(%)
2000	100,062.96	16,253.03	83,809.93	22.35	23.90	22.05
2001	102,280.48	19,234.83	83,045.66	2.22	18.35	-0.91
2002	125,167.89	22,052.68	103,115.21	22.38	14.65	24.17
2003	152,379.24	28,418.49	123,960.74	21.74	28.87	20.22
2004	196,698.98	34,721.01	161,977.97	29.09	22.18	30.67
2005	243,462.33	41,836.53	201,625.79	23.77	20.49	24.48
2006	287,772.79	55,224.16	232,548.62	18.20	32.00	15.34
2007	321,507.79	65,238.31	256,269.48	11.72	18.13	10.20
2008	337,789.78	71,457.07	266,332.71	5.06	9.53	3.93
2009	296,402.13	69,576.05	226,826.09	-12.25	-2.63	-14.83
2010	364,943.81	91,878.26	273,065.55	23.12	32.05	20.39
2011-01	31,349.57	8,078.09	23,271.48	24.48	17.26	27.19
2011-02	27,278.70	8,437.18	18,841.52	16.76	23.08	14.13
2011-03	27,601.44	9,518.84	18,082.60	13.59	28.57	7.02
2011-04	29,567.05	7,971.02	21,596.04	14.13	20.93	11.81
2011-05	32,781.26	7,817.77	24,963.48	12.90	15.77	12.02
2011-06	34,387.37	7,729.87	26,657.50	4.63	15.11	1.93
2011-07	35,125.54	8,170.85	26,954.68	5.61	11.25	4.01
2011-08	37,363.80	8,408.14	28,955.66	5.88	15.92	3.28

資料來源：台經院進出口貿易資料庫，本文計算整理

組和若干磋商機制的合作框架；且中美兩國應共同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恪守G20峰會共識，解決美國對中國大陸貿易逆差的措施，不再是限制美國來自中國大陸的進口，而是在積極發展雙邊貿易中促進平衡(即增加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出口)。而針對中方關注的反對濫用貿易救濟措施、放寬對中國大陸出口管制、承認中國大陸市場經濟地位、為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創造公平環境等問題上，美方則表示，將加強與中方的溝通和磋商，避免濫用貿易救濟措施。美方在進行出口管制體制改革進程中，將與中方合作，妥善解決中方關注的問題，修改相關規定，盡快研究、推動解決中方關注的其他農產品檢驗檢疫問題。

但伴隨著歐債風暴的不確定性，以及美國經濟復甦的走緩，人民幣再次成為美中兩國攻防的議題，美國參議院在2011年10月3日不顧中國大陸當局堅決反對，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預案，「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主要內容是針對操控匯率與貿易補貼的認定問題，要求美國政府調查主要貿易伙伴是否存在直接或間接壓低本國貨幣幣值，形同對本國出口產品提供補貼行為。由於中國大陸是美國最主要貿易逆差來源國，且美國始終認定人民幣嚴重低估，故此項法案又被稱為「人民幣升值法案」。

針對美國參議院通過的「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中國大陸相關當局(外交部、商務部和央行)認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自2005年七月開始實施人民幣匯率改革後，迄今升值超過

兩成，已相當程度反應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且2011年中國大陸貿易順差占國內GDP已降至1.4%，已處於國際公認的合理區間；此外，以過去10年來說，美國對中國大陸出口由2001年的192億美元增至2010年的919億美元，成長3.79倍，同期美國對其他地區出口僅成長67%，顯示對中出口成長相對顯著，且近年來美對中出口成長幅度都遠高於美自中進口的幅度，說明中美貿易關係已邁向正常化。美國此舉等同否認此一事實，逼迫中國大陸當局採取貿易戰，且有礙中美攜手解決當前國際不景氣問題，但美方認為人民幣升值的區間仍然不足，未達到歐美政府預期的水準。

●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產業的可能影響

我們根據美國長期進口資料，進行中國大陸出口價格變動對美國進口金額之影響，以四分位產業來看的話，發現中國大陸有相當多產業在美國市場屬於對價格變化敏感度較低之產業(產業數有103個)，意即表示，除非是人民幣大幅升值，不然對中國大陸大多數出口到美國的產業影響有限；而中國大陸在美國市場受價格變動衝擊較大之產業為：澱粉及其製品製造業、紙容器製造業、石灰製造業、煉鋁業、眼鏡製造業。這些產業會因人民幣升值而直接受到較嚴重的損害，但這些產業並非是台灣出口到美國的主要產業，故台灣要取代中國大陸這些產業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成效恐怕亦不易顯著。

表3 中國大陸在美國進口市場因匯率變動可能受影響之產業數

美國市場	出口變動影響產數	缺乏彈性	富有彈性		彈性大於2之產業 產業代碼與名稱
		$0 \leq \varepsilon < 1$	$1 \leq \varepsilon < 1.5$	$1.5 \leq \varepsilon < 2$	
	產業數	103	58	20	5
	出口額 (百萬美元)	255,914	78,705	17,978	2,071
	出口比重 (%)	71.74	22.06	5.04	0.58
					0863 澱粉及其製品製造業 1520 紙容器製造業 2392 石灰製造業 2421 煉鋁業 3321 眼鏡製造業

資料來源：新台幣升值對我國產業貿易活動之衝擊(2010)

此外，中國大陸市場占台灣整體出口市場達44%，是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國，且從中國大陸各產業別的進出口淨額變化，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國內生產提升速度相當快，在短短十年間，從2,000億美元的出口額國家，快速成長為足以創造超過1兆5,000億美元的出口貿易金額的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家。

人民幣緩步升值應是長期的發展趨勢，雖然台灣有許多產業會因出口至中國大陸以外的國際市場擴張，進而增進出口效益，但我們從台灣166部門的產業關聯表來細看，仍有部分產業是以出口至中國市場為主，人民幣升值所帶來對中國大陸市場的出口衝擊，將大於在其他國際市場上所獲得的效益，故導致人民幣升值後，將對表4所示的產業造成經濟衝擊：

表4 預估人民幣升值10%，對台灣受衝擊產業之影響

產業類別	實質GDP衝擊值 (百萬新臺幣)	變動幅度 (%)
光電材料及元件	-2,345.130	-1.183
其他人造纖維	-15.680	-0.888
其他金屬	-155.808	-0.778
石油化工原料	-473.624	-0.750
合成橡膠	-23.877	-0.517
其他電子零組件	-442.882	-0.317
半導體	-1,201.357	-0.249
塑膠(合成樹脂)	-75.416	-0.160
其他非金屬礦產	-5.523	-0.113
其他化學製品	-19.102	-0.074
石油煉製品	-74.298	-0.058
金屬容器	-2.833	-0.055
基本化學材料	-17.095	-0.048
林產	-0.710	-0.041
產業用機械設備修配及安裝	-14.155	-0.030
金屬加工機械	-1.946	-0.007
建築用砂石	-1.636	-0.007
酒精飲料	-0.257	-0.001

資料來源：人民幣長期升值之經濟影響研究(2011)

這類型的產業，多數是過去台灣投資中國大陸較集中且較大型的產業，像是電子零組件業、石化業、紡織業等相關產業，因這些產業多數是以兩岸三角貿易分工為主，故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大陸出口受損，對這類型產業的影響，將大於台灣在其他

國際市場所能獲取的效益。且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較大的電子相關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多數仍處於價格競爭，定價能力較弱，故人民幣升值的變化，亦將間接對台灣出口造成較大的經濟衝擊，加上兩岸仍有一部份屬於垂直分工關係，若人民幣大幅升值，中國大陸第三地市場的出口損失也可能導致我國中間財產品對中國大陸出口的減少，間接影響到台灣的出口。因此，若中國大陸匯率升值導致中國的出口大幅衰退，進而使得中國大陸企業對台灣中間財進口減少，估計影響台灣較大的中間產業為：液晶面板及零組件製造業、未分類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分離式元件製造業、印刷電路板製造業，以及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等產業。

● 結論

美、中兩國對於人民幣升值的歧見始終存在，雖至目前為止都能獲得彼此妥協的結果，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增強、對美國依賴程度下降，在國際社會地位逐漸提升，反而使美中貿易戰的可能性提高。加上中國大陸和美國在一連串WTO貿易爭端進行角力競爭日益激烈，而中國大陸已能夠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來抗衡美國等對中國大陸採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及貿易壁壘，過去那個中國一味讓步的時代，在金融海嘯發生後，已出現微妙的轉變，美中雙方如果要想在貿易摩擦上有進一步的突破，雙方都得作出實質的讓步。

至於對台灣產業的影響上，我們若從過去日本與台灣的歷史經驗來看，長期人民幣升值後，可能進一步促使廠商往其垂直分工的下游地遷移，重新整合產業鏈，以減少長期人民幣升值的衝擊，在中國大陸的台商所生產的產品也會逐漸往高階附加價值轉型，可能會加快低階產品出現產能淘汰。然而中國大陸出口到國際市場的產品中，多數是走低階的廉價品為主、台灣相關產業可藉此機會推銷本國的優質平價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知名度；台商可針對中國大陸輸入歐美的產品價位水準、客戶群體來進行市場行銷分析，亦將有助於台灣廠商拓展歐美等國際市場的發展。

(本文節錄自《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35卷第2期同名文章，作者為台經院研究所副研究員)

習近平訪美之意涵

■ 陳奕帆

中國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美國副總統拜登(Joseph Biden)於2011年8月訪中後，此次應拜登之邀前往美國，進行五天訪美之回訪行程。於習近平訪問行前，美國主流媒體，多以「誰是習？(Who is Xi?)」作為標題，向美國民眾介紹此位中共儲君。此舉也顯示了，美國以及全世界，已經開始著手準備迎接今(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人事改組後之新局。

● 展現自信

相較於2002年時任國家副主席之胡錦濤訪美，這次習近平訪美，受到相當之禮遇及對待。一方面除了受到美方高規格接待，並在五角大廈以十九響禮炮迎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某種程度之國際政治現實，美、中二國在經歷過十年的時間後，兩國國力與發展跟十年前已大不相同。美國不再是當年可以完全獨當一面的超級強權，而中共在國際間之影響力，也不再是像十年前那般。

令國際焦點矚目的「歐習會」，舉行時間比預定久，顯示兩人在相互理解及溝通上，已開始有著初步默契之建立。假使歐巴馬今(2012)年11月順利連任成功，此次習近平訪美之旅，便是兩國未來繼續合作之契機。美國副總統拜登，除了在華府之外，也兼程趕至洛杉磯陪同並宴請習近平，延續去年8月拜登訪中期間，兩人建立起之良好工作關係。

十年間，美國經歷了兩場半之戰事，亦即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北約主導於利比亞之軍事行動。除此之外，2008年發生的金融海嘯，也讓美國經濟大不如前。雖不致美國衰退，但也因此而氣勢不再。反觀中國大陸，加入WTO的第一個十年，使其年均成長率超過10%；GDP也超越日本，從全球第六上升至第二。因此，習近平此次出訪，多帶著明顯笑容。與當年的胡錦濤相比，即可感受到其自信。



● 親民形象

習近平在中國大陸，被視為是相對比較親民之下一任領袖。特別是其成長背景，少時因父親習仲勛直言上諫，導致全家遭到流放勞改。此一特點使得習近平與中國大陸一般民眾，多了點親近感；同時，也被賦予著延續胡溫體制下，中共政治改革路線之繼承者。此次訪美，也藉由了訪問愛荷華州友人，建立起良好之個人親民形象。

1985年，也就是距今27年前，習近平第一次訪美，時任河北省正定縣委書記。當年，他便率領了石家庄地區飼料代表團，前往愛荷華州訪問。愛荷華州居民後來並未特別注意習近平之政治生涯，直到此次習之舊地重遊，才發現身分早已是不可同日而語。此次重回愛荷華州，亦或許有中國人之追本溯源之感，讓習近平也更貼近美國大眾。

無論是在中國大陸國內，或是在美國國內，愛荷華州之行程，即是一次最佳「軟實力(soft power)」之展現。藉由不同層級之訪問，塑造出習近平親民之形象。另外，洛杉磯湖人隊球賽之行，也展示出中共近年強調「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之重要性。習近平不只面對了華府政治圈內要角，也試著走入群眾，為此次訪美行程，留下重要意涵。



● 合作雙贏

美、中二國，在歐巴馬第一任期，以及胡錦濤第二任期中，相互摸索彼此。美、中關係，並非零和遊戲，而是在碰撞中追求雙贏。無論是在經濟面、政治面，甚至是軍事面，美、中兩國之合作，與十年前胡錦濤以副國家主席身分訪美時，皆大不相同。軍事交流程度雖不至頻繁，但也不是完全封閉，更遑論經濟與政治，兩國早已是密不可分。

經濟方面，美國經濟尚在緩慢復甦中，雖然失業率暫時下降至8.3%，但由於今(2012)年是美國總統大選年，現任總統歐巴馬，定會希望中國大陸能在經濟上能多幫忙、多採購。甫自伊拉克撤軍，並計畫於2013開始從阿富汗撤兵，再加上經濟政績，歐巴馬連任之路，似乎仍是樂觀。也因此，連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也小誇中國大陸人民幣匯率有正面改善。

政治方面，無論是目前依然令人頭痛之伊核、朝核問題，或是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美國亟需中共

配合之敘利亞問題，兩國皆不敢貿進。台灣、西藏……等由中共聲稱之核心利益議題，也只是照本宣科，並無太大意外。美中合作，已經形成不可逆之態勢，兩方也皆無一反常態之作為。兩國之間小摩擦仍會存在，但僅顯示於對內表態，對外仍會相互合作，取得雙贏。

● 結論

習近平此次訪美，雖沒有太多令人訝異的驚嘆點，但也證明了美、中兩國，藉著越來越頻繁之高層交流，更可充分了解彼此。今年為上海公報簽署之四十週年，習近平訪美是否有當年季辛吉訪中之衝擊，還有待後續考驗。但不可諱言的是，此次行程中，習近平展現之自信、親民，代表著習與其他中共領導人不同之個人風格，未來美、中兩國交往，應可繼續邁向康莊大道。

(作者為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博士生，並為民國 99 年外交獎學金得獎者)

意見箱

◎「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係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出版，為國內產官學所組成的非營利性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對於本刊物內容有任何指教者，請逕洽本會編輯部執行編輯黃暖婷（分機 544），更改收件資料請洽林金鳳小姐（分機 529）。

◎ 歡迎由 CTPECC 網站，加入「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Facebook 粉絲頁。

連絡地址：台北市德惠街16-8號7樓
連絡電話：(02) 2586-5000 分機 529、544
傳真：(02) 2594-6528
PECC 網址：<http://www.pecc.org>
CTPECC 網址：<http://www.ctpecc.org.tw/>

